

特别是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深入专题的研究。如国外较早出版的史迪威的文件和档案,近年出版的 Evan F. 编的《卡尔与战时中国》(1993),如能充分利用或翻译过来,对研究国际友人与中国抗战当会大有裨益。另外,有关战时来华人物的档案国外续有发现,国内也多有保存,均可及时整理和出版,以便研究者利用。(二)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全面的、综合的、群体的、比较的研究。高梁所撰《黄河恒河情丝》这本关于印度援华医疗队的论著堪称这方面的力作。我们的研究既应着眼于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应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国际友人的影响。外国人通过中国共产党或通过国民政府来华有助于抗战者均宜研究。对于有的外国人曾帮助我抗战,但因我们的政策失误一度长期疏远者,或因与我们产生意见分歧,但非根本反对中国人民者,也都不应排除在国际友人之外,放弃对他们的研究。政治视野扩大会有助于学术视野的扩大。(三)在认真开展国内学术讨论和交流的基础上,进行有成效的国际学术讨论和交流。对于战时的国际友人国内不少学者纷纷进行研究,有的还成立了学会(如斯诺研究会等),或举行有关会议进行讨论和交流。国内研究有基础,当可更好地与国外研究相交流。实际上,我们着力研究的斯诺、白求恩、史迪威、柯棣华等,他们所在国家的学者亦在研究。应该争取在国际上进行必要的学术交流,这无论对于提高学术水平,或扩大研究的社会影响,都是有意义的。

总之,国际友人与中国抗战课题的研究已在开始深入。此项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和加深抗战史的研究,而且它所提供的史实和论述还可使中国广大青年了解和学习国际友人的国际主义精神,促进中外人民深厚友谊的进一步发展。

简述日军暴行研究的新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近代史研究所 齐福霖

近几年来,中国史学界比较重视日军在华暴行的研究,据不完全的统计,各个出版社共计出版了十多种有关日军暴行的专著、资料,论文约有几十篇。这些著作、资料及论文的出版,把日军暴行研究提高到新水平。

新近出版的著作与资料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对日军在华暴行作了揭露与批判。如李秉新、徐俊元、石玉新主编的《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是以河北省政协文史委牵头,26个省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合作编纂的资料书。该书收录侵华日军暴行2272件,约140多万字,较全面地记述了自1931年至1945年日军在全国各地的暴行。日本学术界很关心该书的编纂。1993年6月,笔者访问日本时,日本学者就问笔者为什么要编纂此书。当时笔者回答说:中国学者编纂日军在华暴行的著作,是为了总结日本侵华的历史教训,为了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为了向广大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了向前看,发展今日的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该书于1995年出版,正适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受到了国内外各界的欢迎和重视。今天,我们以评判的角度来看待这部著作,除了上面指出的优点之外,也谈一点不足。这就是该书没有很好地处理原始资料,编纂的历史事实没有注明出处,结果把第一手资料,变成了第二手资料,影响了它的价值。希望编者在修订再版时予以注意。

笔者翻阅了新近出版的有关日军暴行的著作与资料,感到有三部是很有价值的。一是《南京大屠杀图证》,它是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该书收入图片800余幅,主要是两馆一院收藏的图片档案,也兼收国内外,尤其是日本方面刊布的有关图片。该书真实地再现了50多年前侵华日军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南京进行的,包括杀、烧、淫、掠等各种暴行的大屠杀全过程。该书是中国首次系统编纂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片档案,也是首次出版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片专集。1995年12月,笔者赴加拿大温哥华参加由北美20

世纪中华史学会主办的“1937年至1945年中日战争之再检讨”国际学术研讨会,向研讨会介绍了该书,引起与会各国专家、学者的好评。香港《明报》(美加版)于1995年12月19日,对该书作了专题报道,并用半版的篇幅选刊该书的8幅日军暴行图片,称“这些图片是日人侵华暴行的铁证”。应该说,该书对世界人民认识日军暴行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二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它是章开沅编纂,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该书是以“贝德士文献”有关资料编纂的。贝德士是美国人,1920年至1950年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在1937年至1941年期间,贝德士留守南京保护校产。南京沦陷前后,他起先是南京国际难民区委员会的发起人与组织者之一,随后是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主席。他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以历史学家的眼光,保存了大批文献与资料。这些文献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也是最好的实录。这样宝贵的资料,过去中国出版的南京大屠杀论著却没有加以利用。章开沅先生以对《贝德士文献》的系统发掘、整理及其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撰写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该书是中美两代历史学家为了捍卫历史尊严的一场超越时空的“对话”。该书以它较高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而深受学术界及广大读者的重视。

三是《日军侵华罪行实证》,它是北京档案馆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该书汇集的档案是1946年河北省高等法院奉1945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命令,组织检察官、审判官和承审员等直接进行的大规模日军罪行调查的原始材料。这些资料有被害人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职业,犯罪人的姓名、官职、所属部队机关名称及罪行时间、地点,事实确凿,有极强的说服力。而且,这些材料都是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亲属和邻里提供的,并由法院进行调查的,采用了法律手续。所以这些材料是有法律效力的,是揭露日本对河北以及北平、天津侵略及暴行的重要证据。如此系统地公布国民政府调查的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材料,在国内尚属首次。

日军暴行的研究虽然有了新进展,但要把日军侵华十四年的暴行弄清楚,还需要历史学家的进一步努力。特别是抗战胜利50多年后的今天,对抗战中中国军民伤亡数与财产损失状况的研究还很少。这种状况说明,日军暴行的研究还需更加深入广泛地展开,应多出这方面的著作与资料,并且要多出精品。

加强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观的批判研究

(书面发言)

国防大学 何 理

近代中国是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国家,从19世纪末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先后两次遭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略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利用有利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历史条件,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在华权益,企图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它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敌人。因此,研究日本军国主义历史,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及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方面。

侵华战争的失败使日本军国主义彻底覆灭。但是,日本军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灭亡之后,军国主义的思想影响,特别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形态的军国主义历史观,其影响并未随着军国主义制度的垮台而完全消失。正如卡尔·李卜克内西所论述的,军国主义不仅是一个“控制整个社会的体系”,而且是一个“会使整个社会生活和人民个人生活充满军国主义精神”的制度。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军国主义的“精神”,还会影响一些人。例如,日本侵华战争与军国主义的失败已过去半个世纪,但时至今日,在日本国内,包括某些政治要员,仍然不断散布为侵略战争翻案,否认战争罪行的言论。这种现象决不是偶然的。它表明,日本国内有些人时刻不忘复活军国主义,而军国主义历史观仍有一定的市场。

在我国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从总体上看,研究中过多地注意军国